

亚东遗珍：开启百年新红学之门



胡适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展出，展出亚东图书馆有关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

不重视史料是当下红学研究的缺点

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在艺”于8月25至26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联合举办“陈独秀、胡适与他们的时代——纪念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主题学术研讨会。

中国红楼梦学会原副会长、著名红学家胡文彬首先发言，他认为《红楼梦》的历史背景已经无需赘言，“就是它的研究史，也够今天年轻一代去认真地进行研究”。

他首先回顾了上个世纪初，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与胡适《红楼梦考证》两本著述所引发的新、旧红学论争并直言：“以胡适所代表的新文人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文人之间的那场论争非常激烈。而这场论争到现在实际上仍然在延续，在当下红学研究的争论上，仍然打着胡适的烙印，也打着蔡元培的烙印，并没有完全地去掉胡适的观念，也没有完全地去掉蔡元培对红学研究的观念。”

“今天沿着蔡元培先生的研究道路，索引红学仍然还有市场。”胡文彬举例说近来有人研究提出曹雪芹几十代的老祖宗就是曹操，丹东大孤山的，“这说明蔡元培的灵魂影响到今天，作为一种学术的理念、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还有着很强的市场。所以今天来讨论这一问题，我想胡适先生当年提出的那些观点，包括治学上一些新的方法，从学理、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我认为到今天还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胡文彬认为在西学方面有很大造诣的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特别重视材料、文献的收集。“当年顾颉刚先生、俞平伯先生都受胡适的要求找了大量的材料给他，但在提供给胡适的材料中存在错误，他拿去全部当真的运用。胡适的许多观点，我并不同意。比如说他对后十回的看法、他对作者的看法，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但胡适的心胸是这样，发现错了就是错了，敢于承认错了。胡适的这种精神、这种态度、这种治学的严谨的态度令我非常感动、敬佩。”

胡文彬直言目前红学研究有一个缺点，“过去不重视文本是一大缺点，那么现在重视文本，不重视史料是不是缺点呢？没有历史资料的支撑，我们许多所谓的解读、判断恐怕就有问题。所以我对这样的展览，这样的发现是抱着学习、敬畏的态度。”

红学研究学者乔福锦认为，亚东版《红楼梦》标点本目前学术界还是看轻了，“亚东版的底本不是程乙本，也并不是程甲本，而是另外一个独立的本子，是以道光十二年双清本为底本。在程甲、程乙两个系统之外，其实有第三个系统。”

胡适打开了现代意义上红学的大门

曹雪芹纪念馆副研究员樊志斌提出，“一部书成为一门学，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也不过五六部而已，可见《红楼梦》对国人的意义。无可置疑的是胡适与他包括《跋〈红楼梦〉考证》在内的一系列红学文章，打开了现代意义上红学的大门（西方白话逻辑系统论文架构下的红学研究）。”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胡适之前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最早引西方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红楼梦》研究的文章，但在当时影响有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在当时影响极

大，但在实际研究方式、探求方法上更多地为传统经学研究范畴（小说背后隐藏历史和实际人物、故事）。为了对抗蔡元培的《红楼梦》传统经学模式，宣传自己从美国带回的杜威实验主义学说（胡适认为与乾嘉考证重视证据的精神一致），胡适用自己能够查到的文献资料撰写了《红楼梦考证（初稿）》《红楼梦考证（定稿）》，后来又用买到的曹雪芹友人敦诚诗集《四松堂集》，写作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篇《跋〈红楼梦考证〉（一）》（四纸）。”

警惕把胡适鸡汤化的出版倾向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小明在发言时说，自己从上海专程来京拜观这么重量级的文献特别是手稿、原迹，“感受一下它的气场。有一些东西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新文献的发现，‘罗王之学（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其代表的研究甲骨学方法论）’四大发现都是和文献有直接关系。”

商务印书馆资深编辑孙祚蔚在发言中提到“材料是学术的生命”，而“出版则是学术生命的一种延长，至少是开枝散叶的可能之一。”她介绍说，2012年胡适作品成为公版后

作为编辑自己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一个知识产权或者是一个大IP进入公共领域，对出版人肯定是非常丰富和优秀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种低水平的竞争或者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存在，如2013、2014年左右把胡适鸡汤化的出版倾向非常明显。我很警惕这样的一种倾向。”

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后，“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

（据澎湃新闻）

《红楼梦考证》是催逼下撰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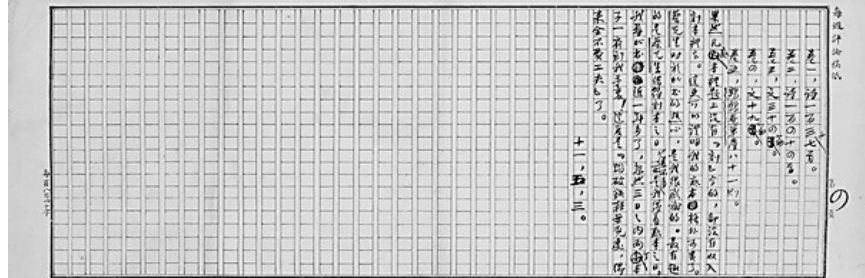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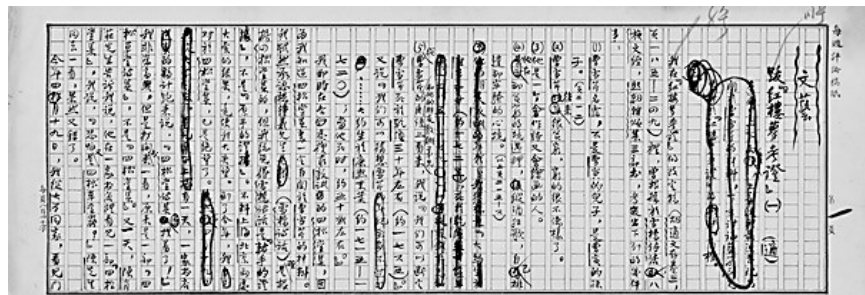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经民国至而今，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颇为引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阶段，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子民先生的商榷”，亦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其时蔡、胡之争各执己见，几番往来并无结果。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著名学者的帮助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小说出版后，以其新颖的版式、标点，认真的校勘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在亚东图书馆所推出的十几种新标点本小说中，无疑以《红楼梦》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

说起来颇为有趣，《红楼梦考证》一文并非胡适主动写成，而是在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不断催逼下撰写的。一位书商催生了一部传世名著，可谓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跋〈红楼梦〉考证(二)》手稿



《跋〈红楼梦〉考证(一)》手稿